浙江工人阶层生存发展状况调查及思考

黄岩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18)

【摘要】调查发现,浙江工人阶层文化程度有极大提高、生活质量有明显改善、竞争意识强烈,但他们相对收入下降,生活压力较大,自我认同度不高。对此,应从调节收入分配、健全保障机制、提升流动能力等多方面着手,寻求应对之策。

【关键词】浙江; 工人阶层; 生存发展; 调查

【中图分类号】 C913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001—9146(2011)03—0037—05

关于工人阶层,历来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定义,广义的工人阶层是一种阶级概念,泛指一切以工资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劳动者集团。狭义的工人阶层是一种职业概念,主要指凭借体力和操作技能资源而劳动的群体。基于研究的需要,本调查将工人阶层定义为凭借体力和操作技能资源在现代企业中从事集体生产劳动,以工资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在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中属于后者的人群。该阶层主要由在各种企业中从事简单劳动、初级技术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工人组成。

为了真实了解浙江工人阶层生存、发展现状,课题组采用自编问卷,于2010年2月—5月在杭州前进齿轮箱集团有限公司,温州万里马皮件服饰有限公司、台州市黄岩凯普机械有限公司等13家企业进行了一次有关“浙江工人阶层生存发展状况”的调查。调查共发放问卷643份,回收643份。在643份问卷中,管理人员为85人,占13.2%;生产工人为303人,占47.1%;服务人员144人,占22.4%;技术人员111人,占17.3%。考虑到本次考查的工人阶层属于被管理者,因此,主要分析的对象为包含“生产工人”和“服务人员”的447份有效问卷,而对于管理者和技术人员的有效问卷,则将作为相关的比照数据。^①

一、调查样本的基本情况

(一) 年龄性别

从年龄层次上看,40岁以下的人口占多数,其中20岁以下的占4%,20—29岁的占63.8%,30—39岁的占16.8%,40—49岁的人员为12%,50岁以上的占3.4%。从性别上看,男性所占比例为65.8%,女性比例为34.2%。数据表明,在岗男性工人比例明显高于女性,且新工人多于老工人,新一代工人正在形成。

(二) 户籍行业

从户籍类型来看,调研对象中农业户口人员占49.7%,这反映了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二三产业转化,并逐步成为工人阶层

收稿日期:2011—03—17

基金项目:浙江省社科规划一般课题(09ZDZB004ZD—2YB)

作者简介:黄岩(1971—),男,江西都昌人,副教授,思想政治教育。

①特别说明:本次调研成员由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的学生(有些已毕业)组成,他们可能更倾向于向自己的同辈人发放问卷,因此样本难免存在相对年轻化、高知化的现象,这可能会在反映真实现象方面存在一些误差。

重要组成部分的现实。

从受访者所在企业所有制来看，国有企业员工为 10.7%，集体企业员工为 5.3%，三资企业员工占 47%，私营企业员工 31.5%，个体企业员工所占比例为 5.3%。从企业的产业性质来看，第二产业的从业人员比例为 80%，第一产业 6%，第三产业 13.4%。这反映了浙江国有和集体企业员工群体逐步缩小，而外资、私营企业工人群体正在不断增大的现实。同时表明浙江产业结构正在朝合理化方向发展的态势。

(三)文化程度

从文化程度来看，受访者大学以上文化层次人员高达 41%，高中(中专)的比例为 47.6%，初中以下文化的仅为 11.4%。这反映了新一代工人知识技术构成不断优化的现实。

(四)政治信仰

受调查者中，中共党员占 16.1%，共青团员占 43.6%，民主党派占 0.7%，群众占 39.6%。从宗教信仰状况来看，信仰宗教的人员为 7.4%，无宗教信仰的 51.7%，40.9%的被访对象选择“说不清”。进一步分析发现，1.3%的党员和 9.2%的团员选择信仰宗教。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属于工人阶级先锋队中的一员，他们对宗教的模糊态度，必然不利于正确贯彻执行党的宗教政策。

二、浙江工人阶层生存发展状况与特点

(一)绝对收入增加，生活明显改善

调研中，有 10%左右的个体没有填写他们的工资水平。通过对有效样本的分析，样本群工人阶层 2009 年月收入以 1000—3000 元为主(85%)，明显高于其它大城市中工人阶层的月收入。(有数据显示，全国几个主要大城市工人群体月收入在 500—1500 元之间的工人数居多，占工人总数的 57.6%)，其中又以 1000—2000 元的比例最高(50.8%)，其次为 2000—3000 元(34.2%)，此外尚有 11.9%的工资收入在 3000—5000 元之间，选择收入在 1000 元以下的比例和收入在 5000 元以上的比例相当(1.8%)。

从消费额来看，49.6%的家庭每月消费支出在 1000—2000 元之间，16.8%的人员全家月消费在 2000 元以上。如果以每户 3 人计算，个人年均消费在 4000—8000 元之间的比例为 49.6%，年均消费在 8000 元以上的比例为 16.8%。参照 2010 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的数据，2008 年全国农村居民高收入户人均消费为 6854 元，城镇居民低收入户人均消费 5374.6 元。浙江工人家庭人均消费基本达到农村高收入户水平，相当于城镇居民的低收入户或中低收入户。一方面表明城乡生活差异的存在，另一方面也表明了工人阶层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下降的不争事实。

从消费结构来看，针对问卷所列的食品、服装饰品、医疗消费、住房消费、旅游娱乐、教育费用、各种人情交往费用等七种主要消费项目，高达 92.3%的被访者将食品选择为前三位消费项目之一，其次分别为服装饰品(62.9%)、医疗消费(42.7%)、住房消费(41.3%)、人情消费(24.5%)、教育费用(21.7%)、旅游娱乐(12.6%)。数据显示，工人阶层的主要消费还是用于解决日常生活必需品，尤其以吃、穿为主。值得关注的是，随着收入的提高，很多工人开始更多地关注自己的身心健康，过去大病小治、小病不治的现象有了较大改变。同时，教育费用、旅游娱乐被部分成员列入占前三位消费项目之列，说明工人阶层的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也占有一定比重。

(二)竞争意识强烈，远期规划明确

随着企业用工自主权不断增强，工人阶层岗位风险意识和竞争意识也在不断增强。问卷问及“您认为个人发展的主要优势

是什么”，结果显示，24.3%的人选择“有技术”，22.3%的人选择“个人综合能力强”，16.2%的人选择“有资金”，14.2%的人选择“社会关系强”。尽管还有25%的人认为自己没有任何优势，但大部分工人已逐步接受了市场经济规则，明白了“打铁还需自身硬”的道理。

一般而言，成功人士都是有长期时间观念的人。调查表明，针对“您对自己当前职业(职位)的长远规划是什么”的问题，39.2%的人选择“不改变职业，选择跳槽”，34.5%的人选择“在现有岗位上不断奋进”，8.1%的人“重新选择职业”，只有18.2%的人选择“没有计划，混一天算一天”。数据表明，高达81.8%的人对自己未来职业有着较为明显的远期规划。

工人们在选择自身职业时，最注重的因素是什么?针对这一问题，调查组设置了10个选项。结果显示，工人最注重的前三位因素分别为：工作收入(72.3%)、工作稳定(23.6%)、发展机会(23%)。而选择“人际关系”和“管理制度化”的比例分别为4.7%、0.7%，位居最后两位因素。这表明，随着整个社会物质化程度的日益加剧，工人群体的行为选择越来越理性化(功利化)，经济价值取向明显增强。

(三)企业忠诚度低，跳槽意愿增加

在部分职工下岗，管理者和工人之间的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日益拉大的背景下，工人如何看待自身的主体地位呢?调查显示，高达29%的工人认为自己和企业的关系是一种“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23%的人选择“各取所需，相互利用”，仅有25.7%的人选择“兴衰与共”，20.9%的人选择不知道。这说明，随着劳动关系向契约化方向发展，工人阶层对企业的归属感大大减弱，越来越多的职工由“单位人”转向“社会人”。

与企业忠诚度减弱相关的是，工人跳槽的意愿明显增加。针对于“您对自己当前职业(职位)的长远规划是什么”的问题，选择“不改变职业跳槽”和“重新选择职业”的比例之和高达47.3%，而30岁以下的年轻人选择这两项的比例之和高达49%。交谈中发现，在员工与企业签订的合同中，短期合同居多，中长期合同较少。

(四)生存压力较大，自我认同度低

为了准确了解工人阶层的生活压力现状，调研组特意设置了“您目前主要的生活困扰是什么?”的问题，并提供了10个参考选项，要求选择三项并排序，认为自己无任何生活困扰的可跳过。通过分析发现，目前困扰工人生活的前三位因素分别为：家庭收入低，日常生活困难(63.8%)；住房条件差，建/买不起房(59.7%)；家人无业、失业或工作不稳定(53%)。这三种因素归根到底是工作稳定性和收入的问题，这说明工人阶层仍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

工人的生存压力在其劳动强度上也能得到进一步验证。调查表明，工人每周工作5天的比例仅为48.3%，每周6天为33.1%，每周7天为18.6%。从工作时间来看，77.3%的工人选择每天劳动8小时以内(含8小时)，25%的人员选择每天劳动8—10小时，此外还有2.7%选择在10小时以上。进一步分析发现，工作时间长的部门主要是建筑工地、服装厂以及住宿餐饮等外来人口比较集中的行业。如建筑工只要天气允许(不下大雨就行)，就天天在外面干着，个别服装厂也就每个月发工资休息一天。在餐饮、娱乐等服务性行业，从业者常常是日夜颠倒，越到假日越忙，且无假日报酬是平时倍数之说。这说明农民工生存压力要大于非农业户口工人。

巨大的生活压力，使工人阶层降低了对自身阶层的认可。调查发现，认为自己收入层次、消费层次和社会地位在中上层的比例均在6%以内，而选择在中下层(含下层)的比例则分别为75.4%、73.2%、71.1%。毫无疑问，如果工人阶层的职业声望过低，必然会导致其理想信念的淡化，以及对抗情绪的增强。这既不利于工人阶层自身的发展，也不利于和谐社会的稳定与发展。调查进一步发现，针对自己子女未来的职业，工人选择最多的是“从政做领导”(34.5%)，其次为“经商或搞实业”(23%)，“科教文卫专业技术人员”(14.4%)，没有一名工人选择“工业劳动者”和“农业劳动者”。

在一个充满活力和机会的社会，人们成功标准，个人的职业取向，应该是多元化的，而“不愿做工人”成为那么多人的共同取向，这既是对社会阶层分化尤其是等级分化严重的一种抗议，也应成为当今社会政治生态、社会生态、经济生态失衡的一个警示。

(五)融入意愿强烈，沟通能力一般

尽管浙江工人面对高强度的工作，不断飙升的房价，以及高昂的生活成本，感到生存发展压力很大，但针对“您是否有可能在您现在工作的城市购买属于自己的住房，并成为一名‘新浙江人’呢?(外来务工人员填写)”的提问，高达 51.2%的人选择“有可能”，其中认为“很有可能”的比例为 22.6%，选择“视情况而定，暂时无计划”的比例为 29.8%，真正选择“绝对不可能”的比例只有 19%。这一方面表明，外来务工人员在浙江能够找到实现人生价值的平台，对所在城市具有高度的认同感。另一方面也表明外来务工人员对自己的未来生活充满信心。关于这一点，可以从本次调研中 59.8%的工人认为自己未来工资会提升，其中认为有很大提升的比例为 9.5%得到验证。

良好的交往能力，是在陌生人社会中有效协调各种社会关系，增强工作成功率和个人幸福率的关键所在。数据显示，高达 58.2%的工人认为自己与陌生人交往能力一般，认为交往能力“很强的”为 8.9%，“比较强的”为 25.3%，“比较弱”的比例为 7.5%。调查进一步发现，工人日常交往的主要对象依次为“家人亲戚”(69.2%)，“同事”(67.1%)，“同学”(50%)，社交中认识的朋友(39.2%)，老乡(31.8%)，网友(2%)。数据表明，工人阶层在人际交往中存在明显的“亲缘社交”特点，而对以陌生人为主体的“社交外圈”利用明显不足。在“流动性”的现代性社会中，提升同“陌生人”交往的能力，无疑是增强自身社会资本的前提条件。

三、改善工人阶层生存发展状况的思考与建议

(一)进一步规范企业内部工资分配。收入分配是工人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也是影响广大职工积极性的关键问题。当前，过大的收入差异主要由两大突出问题造成：第一，收入差别难以客观反映不同职业群体对社会的贡献，而更多地是由于行业垄断、政策优惠，特别是手中掌握的权利所致；第二，劳动收益过低和资本、管理等生产要素收益过高的矛盾日益突出，甚至还有进一步拉大趋势。加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政府就必须坚持以公平正义为价值取向，加大对工资的宏观调控力度，在坚决消除行业垄断、特权利益的同时，按照调高、扩中、提低、取缔非法收入的原则，着力提高低收入水平，逐步缩小收入分配差异。

(二)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党的十七大指出，要加快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保障人民基本生活。加强社会保障工作：第一，各级政府应坚持发展经济与促进就业互动，以发展促进就业，扩大就业规模，改善就业结构；第二，政府应当加快建立适应工人低收入层次需要的住房保障体系，真正实现“住有所居”；第三，要全面推进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进一步增强其规避生活风险的能力；第四，进一步完善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加大保障资金投入，逐步提高保障水平。

(三)积极落实农民工社会权益的保障问题。农民工问题，从根本上来说，是传统户籍制度带来的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问题，就一定要改革现行的户籍制度。在此过程中，还要做好几个方面的工作：第一，建立完善统一高效的劳动力市场体系，消除对使用农民工的劳动歧视和社会偏见；第二，保障农民工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尽力安排农民工子女实现就近、就地就学；第三，在职代会换届选举中适当增加农民工代表比例，将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有关事项列入职代会议题；第四，在加大《劳动合同法》宣传力度的同时，加强法律监督和开展法律援助，对侵害农民工群体合法权益的行为及时监督并有效处理。

(四)强化自致性规则对人的社会流动的决定作用。自致性规则的基本要求是规则的普适性。学者陆学艺(2004)认为，在社会底层强烈渴望改变其经济社会地位的冲动的背景下，如果正常的社会流动渠道变窄或被阻塞，将可能形成影响社会稳定的冲

击波，甚至成为孕育社会动荡和暴力的土壤。工人阶层的弱势地位，决定了他们乃至他们的子女，要想进入较高阶层，其门槛明显要高于“有权、有钱、有势”阶层。因此，政府与社会有义务为工人阶层中的一部分优秀成员恢复、寻求社会流动的能力，保证他们只要具备了某种能力，就同其他阶层一样有机会按照自己的意愿得到相应的社会位置。

(五)重视对企业员工的技能培训与再教育。教育是社会底层向“上”流动最重要的机制，也是推进社会阶层呈现良性流动的主要动力。然而，从现实情况来看，工人在工作时间不能学习，业余时间因为体力疲劳或经济困窘而无意学习。这些因素造成工人难以向管理或技术岗位流动，极大地扼杀了其积极性的发挥。因此，政府应该拿出专项资金，采取政府补贴为主，企业、个人适当负担，或者政府负全责的方式，加大对人才资本的投入，通过对优秀青年工人进行适当的技能培训，提升他们的资源创造能力。只有这样，才能在促进企业发展与工人自身发展的良性循环，增强工人主人翁的责任感、成就感和使命感。

参考文献:

- [1] 陆学艺.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 [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 [2] 朱光磊. 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 [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7.
- [3] 李春玲. 断裂与碎片:当代中国社会阶层分化实证分析 [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 [4] 汝信, 陆学艺, 李培林. 社会蓝皮书:2011 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 [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 [5] 陆学艺. 当代中国社会流动 [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